



日本政治史

第四卷

〔日〕信夫清三郎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516915



2 030 344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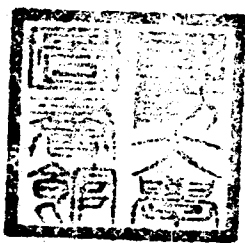
日本政治史

第四卷

走向大东亚战争的道路

〔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启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政治史 IV

大東亞戦争への道

信夫清三郎著

根据日本南窗社 1982 年 11 月版译出

日本政治史

第四卷

〔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 启 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64,000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5327-0244-8/K·007

定 价：6.05 元

凡 例

一、叙述方法见第一卷凡例。

二、日本的历史学一般将“大东亚战争”称为“太平洋战争”。这是因为，当1941年12月日本向美英两国宣战时，在太平洋进行对美英战争的海军也曾建议称为“太平洋战争”。所以，即使称为“太平洋战争”，也不能算是十分歪曲真相。然而，大本营则认为，若要把“中国事变”也包括在内，“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就是不适当的，“由于不管愿意与否，随时都会发展为对苏战争，所以应增加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之政治意义”，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志》，钻石社，1952年，第110—111页）。由于对美英的战争正是日本从“中国事变”的矛盾中挑起的战争，为了正确把握战争的历史性质，将其称为“大东亚战争”，当比称作“太平洋战争”更正确。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日本自1931至1945年的十五年间的历史主流，是对中国的侵略。将十五年间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十五年战争”，也是明确表示侵略中国之意味的一个方法（参见久野收：《围绕十五年战争的意义》、《战争体验的批判与继承》，以及《展望》1970年10月号）。本书有时也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个称呼。有人批判地说，虽说是十五年战争，但并不是在这十五年间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战争。其实，自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欧洲“百年战争”，也并不是接连不断的战争。

三、关于本卷所叙述的历史范围，我已写有《大正政治史》（合卷本，劲草书房，1969年）及《大正民主史》（合卷本，日本评论社，1968年）。这些著作中叙述的史实，本卷尽量予以省略。本卷的内

容与我所著《战后日本政治史》(共四卷,劲草书房,1965—1967年)相衔接。

本书是我把近代日本的政治史作为通史来叙述的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的最后一卷。本卷的主题是说明从日俄战争胜利到大东亚战争失败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兴亡。

在叙述本卷的内容时，我赞成论及两篇关于日本“文化革命”挫折和其未完成问题的论文的内容。其中之一是历史学者色川大吉关于十九世纪的自由民权运动的论述：

“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不断涌现的各种叙事诗般的英雄传说，全都是关于人民群众中的小英雄们的传说，是在民权结社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我愿指出，这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革命。我还认为，这也是一场文化革命。然而，自由民权运动却以失败而告终。由‘蓑笠之楯、锄锹之兵和席旗之队’进行的维新的‘第二革命’，尽管松泽求策^①等寄予希望并进行奋斗，还是在中途遭受挫折。这样，‘被解放了的人’又被强制回到过去的状况，‘已经喷射出来的能量’又受到压制和被转向他处，精神革命遭到了挫折。总而言之，作为未完成的文化革命，这场人民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色川大吉：《自由民权》，岩波新书，1981年，第49—50页）

另外一篇，则是政治学者高畠通敏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论述（高畠通敏编：《山川均集》——《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筑摩书房，1976年，第494页。参见本卷第323页）。

^① 松泽求策(1855—1887)，自由民权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曾参与组织国会期成同盟，后两度被捕入狱。

高岛和色川谈论了“文化革命”，那时，他们所说的“文化革命”的意义未必相同，但他们的论述在叙述日本政治史方面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 2 自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日本人为对付西欧的冲击，其思想和行动的基调是攘夷论的。攘夷论或与锁国论相结合，或与为把“西洋之艺术〔技术〕”嫁接于“东洋之道德”上的亲善论相结合，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吉田松阴原先曾认为，“互市皆得外夷无用之物，导致奢侈淫逸，失却我国有用之货，而缺衣食之资、器用之本”（《狱舍问答》，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二卷，1939年，第268页）。1858年，他改变这一旧的贸易观念，强调“以国家大计言之，如欲振雄略、驭四夷，非航海通市又何以为之耶？”（《对策一道》，同上，第五卷，第137页）同时认为与开国论相结合而形成了走向明治维新的实践纲领（参见本书第一卷，第272—273页）。明治维新乃是形成“独立不羁”之主体的攘夷论与为了形成开国之主体的王政复古论即尊王论相结合的结晶，它结出的果实即是维新政府“万邦对峙”的口号。已形成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试图只从西欧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形成这一“世界史的规律”来观察日本的开国，所以将其视为违背“世界史的规律”的，往往轻视攘夷的意义。因此，我们与其学习历史学者的著作，倒不如学习德国文学研究者片冈启治的著作《攘夷论》（依扎拉书房，1974年）。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则是，当日本国民抵抗维新政府的“有司专制”，开始进行自由民权运动时，在多大程度上以自由民权的思想来克服直至昨天还存在着的尊王攘夷思想。福岛的豪商、民权家河野广中，叙述了他阅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自由之理》（中村正直译）^①后“思想上发生大革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在道德和政治观点上是功利主义者。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论自由》是主要著作之一，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论》。

命”的经过，同时坦率地说“除忠孝之道外，几乎微乎其微”，这是一段著名的话（《河野磐州传》，上卷，1923年，第185页）。新潟的豪农、民权家山际七司这样叙述自己思想斗争的过程：

“余以为，汉学之旧思想与西欧之新思想〔之〕战争，几乎较之从事戊辰战争更难几分，然所幸者，乃旧思想尽败，新思想获全胜，余之喜可知矣。”（江村荣一、中村政则编：《国权与民权的相克》——《日本民众的历史》第6卷，三省堂，1974年，第157页）

所谓新思想“获全胜”，意指其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只有对此加以判定，才是“文化革命”的价值所在。从结局来说，自由民权运动未能克服由尊王攘夷论产生的“国家主义”——国权论，也未能有力地提出作为与民主相结合的“国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论，并使之“获全胜”。自由民权运动只是形成了遭受挫折的重要因素，并遗留下了把“忠孝之道”置于思想革命的范围之外且对大正民主运动和政党政治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因素。

在对付西欧的冲击这一方面，中国虽然比日本更为落后，但为时不久，便展开了日本所不可比拟的彻底的“文化革命”。中国为对付西欧的冲击，经历了洋务运动、变法运动和革命运动三个阶段，并不断深入发展。在革命运动中具有划时期意义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谋求“破坏偶像”，从而出现了“强烈而彻底的社会和理智的变革”的时期（Immanuel C. Y. Hsü〔徐中约〕，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 P., 1970, P. 581, 参见本卷第137页）。

洋务运动，乃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之乱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为对付内忧外患，在自1862年起的同治年间作为“同治中兴”而开始进行的改革运动。这里所说的“中兴”，与日本的“维新”不同，如果根据美国的东洋学者玛丽·克拉巴·赖特夫人所说的定义，“它既

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足点”（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同治] *Restoration, 1862—1874*, Atheneum, 1967, P. 45）。最简明地叙述了同治中兴在文化史上的意义的，是接受了赖特夫人见解的美国的东洋学者本杰明·舒沃茨。他说：

“……象曾国藩、文祥、左宗棠、恭亲王那样的人，基本上是在
4 传统的范围内致力于国内的复兴。他们的‘与西欧的对抗’，依然遵循着贺长龄所编书籍〔《皇朝经世文编》〕所显示之治国策的传统。第二次中英战争〔亚罗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的确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军事技术近代化的绝对必要性。对军事技术的关心，毕竟常常是儒教政治家的正统的关心。孔子本人虽然生来即抱有和平主义的志向，但当理想与现实之间发生矛盾时，则承认以军事力量支撑国家的必要性。……如果把关心军事作为正统，那么关心军事技术的改良，当也能列入卓越的儒教统治术的范围之内……。同治时期政治家对内政改革的处方，代表了政治哲学中最正统的流派。这些政治家既要从太平天国的攻击中拯救儒教的真理，又要独力使国家不解体。”（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严复] *and the West*, Belknap Press, 1964, p. 9—10）

当1875年同治时代被光绪时代代替之后，洋务运动也仍以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中心加以推进，但由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便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为了对付内忧外患，必须把以引进西洋机器为主题的洋务论转变为以改革政治制度为主题的变法论。东洋学学者小野川秀美论述了由洋务论向变法论的转变。洋务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即“内政之改革依据于中国之传统，军

备之充实仰赖于西洋之机器和技术，即西学。而且重视军备更甚于内政”。变法论则是从“西洋致强实为经义之精”的见解出发，认为“军备为末，内政为本”，因而它的特征“已非中体西用，而可谓中即西之主张”（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三铃书房，1969年，第4—5页）。于是，变法论就是主张制度（成法）的变革，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则站在运动的前列。若把中国自洋务论向变法论的转变套用于日本来观察，那就相当于自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向明治维新的转变。变法运动正是把明治维新奉为改革的典范，常常把“变法”称为“变法维新”（彭泽周：《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同朋舍，1976年。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黄遵宪] and the Japanese Model*, 5 Harvard U.P., 1981.）。

由于变法运动标志着自“中体西用”向“中即西”的转变，它便提出了“肩负起二千年来中国的所有思想与近代西欧对抗”这一深刻的课题（高田淳：《中国的近代与儒教》，《戊戌变法的思想》，纪伊国屋新书，1970年，第22页，参见本书第三卷，第312—313页）。

这样，变法运动提出了思想革命，但在1899年却因戊戌政变而遭挫折。变法运动虽然遭受挫折，但促使变法运动产生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之乱，使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赖特夫人指出：

“象1900年的中国那样，以一年的时间而标志戏剧性的分水岭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继义和团之乱后的同盟国对北京的掠夺所暴露出的弱点，终于强迫中国作出最终的选择：或是民族的灭亡，或是国家以及文明的全面变革。中国——清王朝政府、改革派及革命派——在一夜之间接受了挑战。”（Mary Clabaugh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Yale U. P., 1971, P.1）

在清王朝政府、改革派及革命派的争斗中，革命派否定了被改革派奉为变革典范的日本的明治维新。革命的理论家章炳麟更是这样(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辛亥革命的死与生》，龙溪书舍，1974年，第32页，参见本书第三卷，第362页)。

以辛亥革命为目标的革命运动，若套用于日本来加以观察，则基本上相当于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中国要求开设国会的署名请愿者的人数，从1910年1月的二十万名发展为6月的三十万名，10月更增至二千五百万名(张明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台北，1969年，第71页)。在此稍前的1908年8月，中国皇帝发布的上谕《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仿效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关于开设国会的诏敕，定下了为期九年的预备期限(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7—68页)。要求开设国会的革命运动，发起了文化革命，革命派自1901年5月起在东京发行的杂志《国民报》，强调“必须挣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的风俗、思想、教化和学术的压制”，要求打破传统文化的桎梏(小野川：《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45页)。文化革命的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全面开花。在美国的华人史学家林毓生，在其由本杰明·舒沃茨作序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将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运动概括为“总体的偶像破坏运动”(a movement of totalistic iconoclasm)，并分析其特征如下：

“五四运动是针对传统的中国文化遗产的彻底革命，是传统之后(post-traditional)中国史的转折点，这个反传统主义的广度和深度，恐怕在一般近代史上也无类似例子。它是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意识中文化一体性(Cultural identity)的深刻危机的革命。而且，它也是此后文化与理智发达的前兆。”(Lin Yü-sheng [林毓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

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P.6)

若与日本的历史相对应，五四时期则相当于“大正民主”的时期。中国的革命派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思想家、作家为首，专心致力于“破坏偶像”。此时，日本的哲学家和辻哲郎则将其所著《偶像再兴》一书付印。中国五四时期文化革命的展开，照射出了文化革命“未完成”的日本与中国在近代史上明显的本质上的不同点，同时证明，继续进行侵略的日本和继续遭受侵略的中国，不久即由于自满洲事变、中国事变直至大东亚战争的十五年战争，而创造出了使胜者与败者的地位相互颠倒的岔路。以“持久战”对抗长达十五年的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最后胜利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正是从五四运动中产生的。

我着手编写本书的意图之一——如第一卷序言所说——在于找到解决工场手工业论争问题的观点，而这则是我从事学问的出发点。然而，在对付西欧冲击的问题上，日本与中国不同，正如服部之总叙述的那样，要从两国的“社会、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的差异中来寻找原因，但即使这可以用来说明日本侵略中国并获得 7 胜利的历史，却不可能用来说明日本最后败于中国的历史。问题的本质难道不是存在于包括思想与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秩序体制的比较之中吗？——这就是我针对工场手工业论争，想由本书作出的解答，也是我关于进行侵略的日本最终遭到失败，而其历史的转折点即在于大正民主和五四运动时期这一假说的由来。

在本书共四卷的编写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特别从丝屋寿雄、木户蒨、黑田展之、冈本宏、外崎光广、谷川荣彦、溪内谦、户井田道三、上村希美雄(以日文字母先后为序)等

各位先生那里，在弄清论点和搜集资料方面得到格外关照。江口圭一和真锅元之则好心指出了排印中的错误。每当本书各卷出版时，九州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的有关人员即自愿举行讨论会，并约我参加，参加者的所学专业不仅有日本政治史，还包括有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和公法学，十分广泛。所以，我从讨论中受益良多，将讨论结果带回后，便能有助于下一卷的写作。主要参加者有安部俊二、石田正治、黑木彬文、丸山泉、森康博、永山正男、大贺睦南、佐藤雅美等多位。在本书完成时，谨对上述各位的深情厚谊深表谢意。

我最后还要提及的是，中国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的周启乾氏，计划将我的著作译成中文，已将本书第一卷作为《日本政治史·第一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2年1月出版，并计划将第二卷以后各卷继续译出。1931年是我入大学的一年，正值满洲事变发生。此后，我便对继续不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分析，使之成为自己研究学问的出发点，不畏铸错而往来于日本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历经五十年，今天总算勉强完成通史的编写工作。本书得到中国学者寓目，经周启乾氏缜密费心，译为中文，因而在中国获得了读者，乃是我最为高兴的。我在向周启乾氏表示深切谢意的同时，惶恐地等待着中国读者对于未能为阻止日本侵略而作出任何贡献的我的著作，发表感想，提出批评意见。

信夫清三郎

1982年7月29日

目 录

凡 例	1
序	3
第一章 旧日本的危机	1
第二章 中国革命的冲击	71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28
第四章 天皇制的危机	187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254
作者的话——致中译本读者	443
译后附记	448
索 引	449

第一章 旧日本的危机

3

银座虽然还是银座，……但可以看得出，连市街上也是一片失望的景象。自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间^①，连素不相识的人在街上见了面，也都想要相互交谈搭话，而现在，又恢复到原来素不相识的老样子了。因此我想，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别的什么，难道就没有一种能使大家具有战时那种心情的生活方式吗？我边想边走着。

——国木田独步：《号外》（1906年）

*

*

*

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的1905年，正值二十世纪已经过了五个年头，明治国家的历史不久也将达到四十年的时候。日本在这四十年间，如木户孝允所说的从“诸事十岁或十一二岁小儿之所作”成长起来，迅速达到“成人”的水平，与美、英、法、德、奥（奥匈）、意、俄这欧美七大强国为伍，一跃而成为地球上“八大强国”之一的“一等国”。自1905年底至1906年初，日本的驻外使馆由象征“二等国”的公使馆升格为象征“一等国”的大使馆。与此相反，日本为了把其成为一等国当作脱亚入欧的成果加以夸耀，仍让驻中国的使馆保持为公使馆。

^① 指明治三十七年和三十八年，即公元1904和1905年。日俄战争于1905年9月由双方签订《朴次茅斯和约》而告结束。

4 日本就这样一跃而成为一等国。日本实现了近代世界史上少有的急速发展——高度成长，其理由到底在哪里呢？

第一个理由，在于领导明治政府的官僚——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的政治指导。他们痛感日本是一个后进国，便以“万邦对峙”和“富国强兵”为国家建设的方向，并亲自历访欧美各国，接触先进国家的文物，认清日本的课题，起用旧幕府培养的启蒙思想家为政策官员，忍受着财政负担，以高额报酬聘请为数众多的“御雇外国人”，谋求他们的直接指导，又派出大批留学生，真正向世界寻求知识，制定出国家的建设计划。他们一方面确定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英国为将来的目标，在眼下则又以欧洲的后进国家德国为榜样，集中精力学习。他们就这样维持建立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描绘出资本主义建设的设计蓝图，不久完成了帝国主义的构图。但是，完成帝国主义的构图，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自立迟缓，尽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依靠官僚军阀的政治指导。日清战争时，外相陆奥宗光号召“豪商巨族之有志者”经营朝鲜京城、釜山间及京城、仁川间的铁路，却因他们“迟疑逡巡”，而慨叹“外交上既得之让与亦竟至归于画饼”。1898年是通过所谓对中国的“瓜分”，表明帝国主义已成熟之年，德、俄、英、法等欧洲强国，相继从中国租借胶州湾、辽东半岛、威海卫和广州湾，日本也争取到关于福建省不割让的公文。但是，就在同年11月，首相大隈重信在第三次农工商会议的演说中，进一步痛斥“豪商巨族”“迟疑逡巡”。大隈首相是日本最初的政党内阁——宪政党内阁的首相。而他的指责进一步揭示了问题的核心：

“如所知，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地位已在东洋发生变化，尤其是日本在中国之地位已有变化。如所知，日本战前在中国之条约与欧罗巴诸国在中国之条约颇为不同，日本无最惠国条款，且有对日本十分不利的条约。然根据战后之条约，日本在中国获得相

当之利益，且有了最惠国条款，故将来其他各国享受之利益，日本亦均得享受。再者，根据战后之条约，居留地扩展至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处，其他如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亦有日本之专属居留地。在居留地内，只允许日本人居留，并有警察权和道路之管辖权，几乎与日本内地具有同样权利，每处居留地有二十万坪〔一坪为三点三平方米〕以上或三十万坪，至少也有十万坪以上。因此，政府在中国应做之事，于此三年间颇有进展。然向中国做生意事……自生意方面观之，若谓有何变化，则遗憾的是，日本商人在支那的活动，我观察之，几与战争以前无甚差别。”

大隈首相强调：“若谓日本人有能前往专属居留地修建房舍者乎，乃无此种人也，盖杂草丛生，仅支那人修建房舍，如某居留地者，除领事外无日本人，此实堪遗憾。”他指出：“三年间，政府于支那所获利益虽非比寻常，然若问究有多少国民前往工作并得其利益，则十分遗憾，并未做多少工作。”他警告说，尽管各国“花费巨资，派出军舰，以非常之手段，为获得在支那之利益而竞争”，但“我方却以为此竞争与己无关，对只有一水之隔的支那实冷淡也”。他再次发出警告说：

“当今，国际上之竞争重在利益。此利益，单凭政府自身努力不能得，国民须努力。〔作为〕整体而言，应由国民首先前往，获得某种利益，即由国旗加以保护此利益。而当今则是政府首先前往，得充分之利益，并奠定日本人随时都可前往的基础，然国民却尚未充分行动起来，此实堪遗憾。”

虽然大隈首相对此表示遗憾，但“国民”却尚未积蓄起先行于“国旗”的力量。1901年，桂内阁以桂太郎为首相而告成立。它断定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自然不能象英美那样依靠民间资本家自己的力量，若非政府给与超过德、法对资本家的援助那样的帮助，